

# 「中國思想史」課程源流考察——兼論 中文系「中國思想史」的教材\*

李宗定\*\*

## 摘 要

「中國思想史」是臺灣各大學中文學系的必修學科，也是各中文研究所入學考試的專業科目，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臺灣的中學教育並無「哲學」課程，學生對於中國哲學的認識多半來自「國文」，以及「歷史」課程中的簡單介紹。這樣的學習非常簡略，又因考試導向，教學僅只能是知識的背誦，很難進行哲學思考論辯。學生沒有哲學的學習經驗，也未曾接觸哲學文獻，當考入大學中文學系，面臨「中國思想史」課程時，往往感到困難而無所適從。因此，授課教師往往得花費時間引導學生進入哲學思考，但這種思考轉向對於習慣知識背誦的學生而言，往往事倍功半，於是最後常流於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導致學習效果不佳。該如何帶領學生進入「中國思想史」？了解此課程的由來與沿革，以及「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的異同，或許是入門的第一步。中文系開設「中國思想史」與哲學系講授「中國哲學史」，兩者科目名稱不同，但是多用相同教材，課程內容也相同，這種情況有其歷史淵源，又有兩系所代表的中西文化對比。至於「中國思想史」的教學用書，目前大多使用或參考勞思光先生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勞先生的著作批判力強，論述精深，但對於初學者來說，並不是一部合適的入門書，如做為上課教材，授課教師必須花費心力講解勞著中的各種問題，有時反客為主。而各種《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的著作，何種較適合做為教學用書？理

\* 本文初稿發表於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第十九屆國際會議（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SCP）：中國哲學與當代世界（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香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5.07.21-24。

\*\* 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副教授。

想的教材須具備何種條件？本文從教學出發，針對中文系「中國思想史」課程的教材，進行觀察分析。

**關鍵詞：**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系、哲學系、哲學教育



# A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 With a Discussion of Its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by Chinese Departments in Taiwan\*

Lee, Tsung-Ting\*\*

## Abstrac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cours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is so important in Taiwan academia, both in the sense that the course has been taken by all Chinese Departments a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so far, and that it has often been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subjects of admission examination at postgraduate school level. But, given the lack of philosophy course in 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al policy, graduated students who finally major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ten find it difficult to lear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well, though they had received basic philosophical training from certain related courses, such as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history, which are focusing on reading texts by rote mechanically instead of thinking or disputation. For this reason, lecturers in universities have to spend much more time to introduce the importance of thinking, even though it seems so ineffectively to change students’ habit of learning by rote at all. So is there any method to guide students into the cours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effectively? The first step, in a sense, might be both a clarif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 of the course as well a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related concepts, i.e., “thought” and “philosophy”. Though being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course name, the cours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offered by Chinese Department and the cours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Philosophy Department,

---

\* Paper presented at “19<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eld b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ly 21-24, 2015.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Shih Chien University.

historically speaking, often both use the same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similar course schedule. Among a great number of academic writing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as teaching material, *Xinbian Zhongguo Zhhexueshi*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 New Version), written by professor Sze-Kwang Lao,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appreciated one. But Lao's book does not function as a kind of elementary material, for it is sophisticated enough, not only for freshmen who begin to learn Chinese philosophy, but too for lecturers who would be involved in interpreting various philosophical views implied in Lao's book, to the extent that the original texts would be easily neglected of instead. For a lecturer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w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when choosing the most appropriated teaching material? Or, more basically, what condition(s) should be satisfied for an ideal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philosophy? From a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this article aims at investigating several issues pertaining to materials used in the cours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offered by Chinese Departments in Taiwa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inese Department, Philosophy Department,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 「中國思想史」課程源流考察——兼論 中文系「中國思想史」的教材

李宗定

## 一、教授「中國思想史」面臨的問題

臺灣的中小學教育，沒有任何專門哲學課程，幾乎沒有關於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教學內容。唯一與中國哲學有關，是高中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但高中生修習這門課，並不在於培養思辨批判能力，只著重語言訓練，針對升學考試答題而已。「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已是如此，遑論「國文」課程中僅有的先秦諸子選文，更無法使學生對中國哲學有所認知。<sup>1</sup>至於西方哲學，也只有在歷史課程中略有介紹，但也都流於片段的知識。換言之，臺灣所有受過中學教育的學生，沒有任何思考論辯的訓練，也不知道「哲學」為何。因為陌生而產生的各種偏見，再加上重視實際成效與經濟價值的社會氛圍，哲學並不受臺灣社會重視，也並非大學重要學科。<sup>2</sup>

<sup>1</sup> 臺灣教育部定有高中國文核心選文三十篇，屬於中國哲學領域，僅有《荀子·勸學》，且這篇入選並不從思想史角度談荀子與孔子關係，也不分析荀子因性惡主張以後天修養學習矯治，反而著重學習的重要，以此訓勉學子。除此之外，其餘先秦諸子與兩漢之後哲學相關文獻，全部付之闕如。另外，高中歷史的先秦部份，諸子思想佔有一小節，但也僅止於一些關鍵字詞的記誦，而無任何深入的分析。尚有一門「世界文化史」的選修課，其中「華夏文明」有涉及簡略的中國思想史，「西方文明」則有西方哲學史概要。但所佔篇幅皆少，且哲學是與宗教、藝術等並列。

<sup>2</sup> 臺灣各大學除了哲學系的「哲學概論」為必修課程，其他都是在通識教育，且為選修。少數例外者，如臺灣大學醫學系將「哲學概論」列為必修。相較於醫療專業學科，醫學系學生多將「哲學概論」、「醫學倫理學」視為不必要課程。這樣的想法，也反映出臺灣教育體系乃至社會，只重知識技術，缺乏思辨論證的能力。林火旺對此有深入討論，他認為社會不能沒有道德教育，但是教育的方式不能以教條為之，關鍵在理性思辨能力的培養，見其《道德：幸福必要的條件》（臺北：寶瓶文化，2006年9月），頁85-107。

學生在學習成長過程中不識哲學，就算進入大學，也是如此。然而，就讀中文系的學生在大三時，有一門必修科目必須面對，即「中國思想史」。<sup>3</sup>對沒有任何哲學訓練的學生而言，面對這門學科，視為沈重且難以跨越的障礙。在臺灣的大學中文系課程中，「中國思想史」是研究所考試必考的專業科目，相較於另外兩個專業科目「中國文學史」與「小學（文字學、聲韻學）」，思想史的份量頗為沉重。文學史雖然範圍很廣，但相對容易準備，因為中小學的語文教育，「國文」這一學科的教材，幾乎都是從文學的角度選文與授課，因此中文系的學生對於文學史自然有幾分熟悉感。至於「小學」有許多專有名詞，其實困難，但有一些學校簡化了研究所入學考試，只考文字學，或者不考「小學」。

反觀「中國思想史」，不只升學考試必考，也是必修科目。由於學生幾乎沒有接受任何的哲學訓練，對於問題如何產生，進一步對問題進行分析、論證，判斷論證的有效等，都非常陌生。此外，關於中國哲學範疇中所涉及的文獻材料，除了被改為選修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介紹四書，以及中學時國文教材中少數選自先秦子書的寓言或篇章，學生幾乎沒有接觸過任何與中國哲學相關的文獻。可想而知，在這樣的學習背景下，中文系學生在面對繁重的「中國思想史」，因陌生而產生的恐懼與排斥。不懂哲學思考方法，也沒有讀過哲學文獻，不只讓學生在進入這個學科時心生畏懼，教師在授課時也面臨困難。如果不僅止於講授文獻，而希望在課堂上分析思辨，甚至進一步藉由中西哲學對比，突顯中國哲學的特質，在教學上必然會遇到學生背景知識不足，不知從何說起之慨。學生沒有相關哲學訓練，教學時除了講授「中國思想史」內容，還得解說哲學觀念，彷彿再多上一門「哲學概論」，容易造成教學進度的壓力。

而另一個在教學上的問題，在於教材的選用。此言並非否定前輩學者編寫《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哲學史》的努力，而是目前各中文系乃至哲學系使用的教材，大都不是為了授課的目的而寫，亦非針對初入門者。授課教材或講義，與研究專著是不同的，教材是學習者的指引，作為課堂教學之用，應簡明易懂；研究專著則是以中國哲學為研究對象，用哲學方法分析申述，適合深入研究者，這是教學

<sup>3</sup> 臺灣各大學中文系都將「中國思想史」安排在大三，以課程規劃的角度言，大三已具備一定傳統文學知識背景，以及一些中文能力的訓練，所以可以修習「中國思想史」，這也反映本學科具有一定難度。以時數言，大多是上下學期各三學分，或三學期兩學分，總共六學分。

與研究的差異。目前各大學於教授「中國思想史」所使用的教材，大都是研究專著，教師於課堂教授使用或學生自習閱讀，恐有一定困難。

所以，學生沒有哲學訓練的背景，又缺乏合適的教材輔助，在「中國思想史」教學便是難上加難。由於受限於目前高中課程綱要，學生在進入大學前，幾乎無法從正規的學校教育學習哲學相關知識，即便有志之士推廣哲學教育，但是影響與成效仍有待評估。<sup>4</sup>由於此一問題涉及中學教育的整體規畫，並非本文所能處理，然而學生不具哲學概念而修習「中國思想史」的情形，應該從改善教材著手，即恰當的教材，應有助於教學與學習，至少對於初學者不至太過艱深。

在深入論述教材前，本文擬先從「中國思想史」的學科沿革開始討論。為什麼中文系得開「中國思想史」這一門必修課？相較於中國各大學中文系，這個的課程為臺灣獨有。另外，又為什麼以「中國思想史」為課名？「中國思想史」是中文系的必修科目，哲學系也有一門必修科目——「中國哲學史」，而歷史系也多有開設「中國思想史」為選修科目。中文、歷史系開課以「中國思想史」為名，而哲學系則以「中國哲學史」名之。為什麼看似相同的課程，卻有不同的名稱？「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究竟有何不同？而且中文、歷史系與哲學系壁壘分明，彼此課名從未相互使用。究竟是名稱有異，授課內容也有別？亦或是名異實同？考查「中國思想史」的課程沿革，將有助於析論教材的編寫與使用。以下分從課程沿革、學科內涵、教材等，依次討論。

## 二、「中國思想史」課程的沿革

追溯「中國思想史」此一學科的來源，得從「中國哲學史」此一學科談起。「哲學」(philosophy)一詞，是日本明治初期教育家西周，以漢字「哲學」翻譯希臘文 philo-sophia 而來。中國學術界本有「理學」之譯名，又有「格學」、「智學」、「愛智學」等名，唯民國初年自日本引進「哲學」此一譯名，在梁啟超、蔡元培、王國維等學者大力推廣下，逐漸為中國學術界使用。

清末引進西方學術分科觀念，實行學制改革，建立大學的分科與課程安排。

<sup>4</sup> 有一些關心台灣高中哲學教育的學者、老師，於2013年組成「臺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舉辦講座、論壇與營隊，致力於促進高中哲學教育。另外，臺大哲學系林火旺教授帶領一群種子教師，於寒暑假舉辦多屆高中生「愛智營」，推廣思辨與品德教育。唯這些營隊的規模與參加人數，與全體高中人數相較，仍為少數。

清末朝廷學部於 1904 年頒行〈奏定大學堂章程〉，大學堂下分八科，「經學」居首，「文學」獨立成科，<sup>5</sup>此時「哲學」尚未列入分科。「哲學」之所以未能成科，其因在於清末在中學與西學的對立中，有著實學致用的考量，更恐懼西方哲學的入侵。如張之洞便認為在大學無設置哲學之必要，蓋西洋哲學不出戰國名家與佛教經論，中國經傳早已有之，實不必「舍四千年之實理而驚數萬里外之空談。」<sup>6</sup>王國維對此則有所批評，他認為「大學分科，不列哲學，士夫談論，動詆異端。國家以政治上之騷動，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釀亂之麴蘖。」如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學術界當破中外之見，始得發達。<sup>7</sup>王國維認為〈奏定大學堂章程〉的「根本之誤」在於「缺哲學一科」，因此另提一份分科清單，以為文科大學可包含經學、理學、史學、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五門。「經學科」不是傳統經學，已具後來「哲學系」雛型，且文科五門皆設有哲學課程，經學與中國文學兩門皆須修習「中國哲學史」與「西洋哲學史」。<sup>8</sup>

中華民國建立後，國民政府於 1912-1913 年相繼頒行了〈大學令〉、〈大學規程令〉，明定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sup>9</sup>這個學科架構基本上延續清末〈奏定大學堂章程〉，唯一的不同，是廢止經學科，十三經散入改制後的大學文科。<sup>10</sup>文科下設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四門，哲學門有「中國哲學類」，

<sup>5</sup> 清末變法興學，將西學納入學校體系中。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進奏〈欽定大學堂章程〉，是為庚子後新政之一。由於此章程為奉慈禧之旨，針對戊戌變法，強調忠君思想，所規定的大學堂體制，採中西並用，多仿自日本。此章程未及實施，復於 1904 年修訂頒布〈奏定大學堂章程〉，並實施之，標誌著中國現代學制的誕生。章程內容參閱《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朱有獻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4 月）相關研究可參考《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錢曼倩、金林祥編著，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1 月）、陳寶泉：《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王映文：《晚清新式學堂制度之建立：日本影響因素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

<sup>6</sup> 張之洞：〈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摺〉，收入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 3 月），頁 108。

<sup>7</sup> 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靜安文集》，收入《王國維遺書》第 3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3 年 9 月），頁 526。

<sup>8</sup> 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靜安文集續編》，收入《王國維遺書》第 3 冊，頁 697-699。

<sup>9</sup> 教育部〈大學規程令〉，《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第四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年），頁 4-6。

<sup>10</sup> 民國元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中提出「普通教育，廢止讀經；大學校，廢經科。」（蔡元培：〈對教育宗旨案之說明〉，《蔡元培全集》，臺南：王家出版社，1968 年 2 月，頁 117）這個構想，獲得支持。除了袁世凱稱帝時曾短暫恢復，

其中有「中國哲學史」科目，另有「外國哲學類」；文學門則有「中國文學類」和細分的各外國語文類，「中國文學類」以文學和語言學為主，且有「哲學概論」課。

<sup>11</sup>基本上，「文科」所分的這四個學門，已具後來大學文學院之哲學系、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與地理系的雛型。而且「中國哲學史」已做為一個學科的課名，歸屬於哲學門，之後也一直是哲學系的重要學科；至於「中國文學類」以文學和語言為兩大主軸，也成了後來中文系授課的重要方向。

做為當時全國唯一的國立大學，北京大學便以此分科招生，所開課程依〈大學規程〉所訂。由於經費有限，師資與招生人數不足，1917年以前，文科只設置了中國哲學、中國文學與英國文學三個學門，之後增設史學門。在這個時期，中國哲學門有「中國哲學史大綱」與「中國哲學」等課程。而中國文學門所開設的九門課程中，有一門「哲學概論」。1919年北京大學進行學科改制，學門改為學系，課程也進行調整，中國文學系不再開設「哲學概論」，但有一門「哲學史大綱」，由胡適授課，其後中文系就再無哲學課程。同年，中國哲學門改為哲學系，開設「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兩門課程，其後，「中國哲學史」一直是哲學系必修的重要課程。至1925年，中國文學系的課程分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又分A、B、C三類，A：語言文字，B：文學，C：整理國故之方法。<sup>12</sup>1938年，朱自清、羅常培受教育部委託，擬定〈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草案〉，次年修訂頒行〈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科目表〉，此規畫案將中文系分為文學與語言文字兩組，基本上確立了之後中文系的專業走向。<sup>13</sup>從課程角度觀之，中文系的重心在文學和

---

此後中小學廢經學，大學也不再有利經學獨立設科。

<sup>11</sup> 相較於文學、地理、歷史，哲學獨立成科的時間最晚，從哲學的名稱與內容之爭議，以及其與經學所代表的新舊／中西之爭，都顯示「中國哲學」此一學科的成立，標識大學學科制度的現代化（西化）走向的完成。可參考劉青峰、金觀濤：〈觀念轉認與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二十一世紀》127期（2011年10月），頁77-89。

<sup>12</sup> 參見《國文學系學科組織大綱摘要》、《國文學系課程指導書》（民國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學日刊》，1925年10月13日。轉引自陳平原：〈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臺大、港中大的「文學教育」〉，《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29卷），頁4。陳平原指出，這與目前很多大學中文系的語言、文學、古文獻三分天下，有類似的方地方；但當初之「整理國故」，包含日後獨立成科的考古學。而北京大學中文系在1959年設立「古典文獻專業」，與文學、語言並列，確立了中文系分為三個專業的三足鼎立。

<sup>13</sup> 朱自清將中文系分成兩組的規畫，雖然獲得採納實施，但他卻對兩組的課程過於分明，而有不同意見。他認為，文學與語言文字兩組之分，只是一些學科在必修與選修的比重不同，但學生仍必須兼修兩者。（朱自清：〈部頒大學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商榷〉，

語言，中國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則屬於哲學系，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直延續這個傳統，中文系並未開設中國哲學相關課程。而中國其他國立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規畫，在49年之前，基本上取法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課程體系，學生學習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學語言。在現代大學的分科確立過程中，理、法、商、醫、農、工都是西學，連文科的哲學亦是，故中文系的設立與課程，或許也具有對抗西學的背景與歷史意義。

尚可注意的是，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與其他公私立綜合大學的中文系有些許不同。師範大學的國文學系為培育中學國文教師，在課程設計上除教學相關科目，有關中文專業的課程則除了「語言文字」與「文學」，還強調「學術思想」。據黎錦熙與錢玄同在1938年所撰〈師範大學國文系科目表說明書〉，其中關於「本系課程要旨」說明如下：

因為中等學校的國文教材，語體文與文言文並選，關於文體，則記敘文，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等等都要分別講授，高中的國文課程，則純文藝及關於文學源流，學術思想的文章，都要選講其代表作品並須酌授文字學。所以本系的教材，包括(一)語言文字學，(內分字形音韻義訓文法諸項)(二)文學，(內分文學史，文論修辭學，各體作品諸項)(三)學術思想(整理方法及分析評訓並重)三類。其內容注重歷史的變遷，使學生明瞭本國的語文，文學，思想各方面演進的真理。<sup>14</sup>

師範大學國文系的課程設計，在中文專業的「語言文字」與「文學」兩項，與其他大學的中文系相同，但是在「學術思想」一項，則包括文獻「整理方法」與「分

<sup>14</sup> 《朱自清全集》第二卷，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朱自清對中文系開課的一些看法，雖有其時代背景，但有些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啟發。他還提到「學生應多讀專書」，對於今日中文系的課程傾向實用與技術性，或許也可帶來一些反思。此〈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科目表說明書〉，刊登於《西北聯大校刊》，1938年8月15日第一期，頁41-50。本文轉引自沈衛威：〈「國語統一」、「文學革命」與中文系課程的建制——早期國立大學的課程建設〉，收入《大河之旁必有古城》（臺北：秀威資訊，2011年5月），頁260-261。沈氏從新文學運動的角度將民國初年的大學中文系畫分為「北京—清華」與「東南（中央）」兩個系統，師範大學因培育學生的目標不同，又自成體系。可參考其〈現代大學的兩大學統——以北京大學、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為主線考察〉，收入《大河之旁必有古城》，頁201-232。

析評訓」，前者與其他大學的中文系之整理國故相類，但後者則近於哲學分析。故這份〈說明書〉所列舉的「科目表」，雖沒有「中國哲學史」，但在二至三年級的必修科目，分別列出「周至唐思想概要」、「宋元明思想概要」與「清代思想概要」三個科目，已有「中國哲學史」之實。這個對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科目的課程概念，延續至臺灣的三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另外，北京大學「中國史學門」自 1919 年改制為史學系，中國史課程增設「中國哲學史」一科，<sup>15</sup>另據教育部於 1940 年公佈的〈歷史學系必修選修科目表〉，將「中國哲學史」列為選修的專史科目，各校依循之。<sup>16</sup>在這個時期，「中國哲學史」是哲學系的課程，歷史系也有開設，中文系則完全沒有。一直到 1947 年，教育部訂定之中文系課程，方將「中國哲學史」列為選修，1948 年後改為必修。<sup>17</sup>至於「中國思想史」則在一些學期課程中零星出現，已成為一門正式學科。如 1934 年北大哲學系有一門容肇祖開的「中國思想史」課，開放中文系與史學系學生選修。<sup>18</sup>1935 年並出現在文科史學部研究所的入學考試選考科目。<sup>19</sup>「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同時在哲學系開設，看似兩門不同的學科，但據任繼愈的回憶，這兩門課的授課內容都一樣。之所以稱「中國思想史」，是因為胡適時任文學院院長，將「中國哲學史」更名所致。<sup>20</sup>胡適受傅斯年主張「中國完全沒有哲學」的影響，將「中國哲學史」研究更名為「中國思想史」，這個轉變，可以視為西方哲學進入中國後，在中國哲學的研究範圍、方法與論證上遇到困難，引發學界反

<sup>15</sup> 尚小明：〈抗戰前北大史學系的課程變革〉，《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頁 115-133。

<sup>16</sup> 《大學科目表》，教育部編（重慶：正中書局，1940 年）。歷史學系面臨西方學術的衝擊，又不同於中文系，因中國本有悠久的史學傳統，在新史學與學院史學建立的過程中，其間中西的對立，傳統與現代的拉扯，亦是中國近代學術史的重大課題。可參考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2002 年 2 月）。

<sup>17</sup> 《大學科目表》，教育部編（重慶：正中書局，1947 年）。

<sup>18</sup> 《國立北京大學一覽（民國 23 年度）》（北平：國立北京大學，1934 年）。

<sup>19</sup> 《國立北京大學一覽（民國 24 年度）》（北平：國立北京大學，1935 年）。

<sup>20</sup> 據陳明的訪問，任繼愈說：「給我講哲學史的叫容肇祖先生。胡適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中國哲學不成體系。他貶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課叫中國思想史，不叫中國哲學史。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中國有哲學，不是沒有哲學。因為胡適是文學院院長，所以課後他有發言權，課程名稱都是他定的，內容還是那個內容，換個名稱啦。」引自《世紀老人的話：任繼愈卷》，陳明採訪，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年 8 月。

省的結果。<sup>21</sup>胡適於 1931 至 1937 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是「中國思想史」這一學科開始建立的重要時期。不獨胡適面對「哲學」的態度有所轉變，由於「哲學」為西學，整個學界勢必得回應「中國有無哲學」這個問題，若中國學術研究欲擺脫「哲學」的糾纏，就得另以「思想」取代並回應之。可見得「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在名稱與內容上的差異，兩者實有不同。

當北京大學積極進行課程改革時，日本政府於 1928 年在臺灣成立臺北帝國大學，初設文政、理農學部。次年，文政學部「文學科」設「東洋文學講座」，教授中國文學相關課程。<sup>22</sup>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原「臺北帝國大學」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學校組織制與制度則依國民政府教育部相關大學法規進行調整，「學部」改「學院」，文政學部分文學與法學兩學院，「科」改「系」，文學院初設中文、歷史與哲學三系，是臺大中文系正式成立之始。<sup>23</sup>改制後的臺大中文系，一開始百廢待興，自 1948 年臺靜農先生主持系務後，陸續聘任多名教師，許多與北京大學有所淵源。臺大中文系從 1947 年開始招生，當年度的課程，依教育部審定公告之課程，排定「中國哲學史」為選修課，而主要課程沿用北京大學中文系，分成中國語言文字學與中國文學兩組。但因學生人數關係，課程真正趨於穩定應至 1949 年後。自 1949 至 1964 年，「中國哲學史」皆為二年級必修課，由范壽康先生授課，另有「哲學概論」一科，也列為必修。<sup>24</sup>在此一時期，中文系與

<sup>21</sup> 關於胡適的思想變化，可參考羅志田：〈大綱與史：民國學術觀念的典範轉移〉，《歷史研究》，2000 第一期，頁 168-174；歐陽哲生：《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2011 年 11 月）。

<sup>22</sup> 「學部設『講座』，相當於今之研究室，經費預算獨立，附設圖書室。每一講座由一位專任教授主持，其下編制助教授、助手、講師及僱員等。……文政學部設有哲學、史學、文學以及政學四科。以文學為主修者，畢業稱文學士，以政治、法律、經濟為主修者則稱法學士。第一學年有 12 個講座，其後陸續增設至 25 個。」（林秀美：〈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簡介〉，《臺大校友》季刊，第 6 期，1998 年 4 月）

<sup>23</sup> 以上簡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 1929-2002》，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撰，2002 年 7 月。另可注意兩點，其一，臺北帝大原採歐陸講座式教學，較重研究，改為臺灣大學則變更為美式學分制，在教學上變動極大。其二，臺灣光復初期，因人才缺乏，百廢待興，臺灣大學留用許多日籍教授，東洋哲學（中國哲學）亦有之。政府遷臺後，方有大量中國籍教師取代之。相關問題可參考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3 月）、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 2 月）。

<sup>24</sup> 以上所述，參見林姿君：《臺灣大學的語文學教育及其相關問題初探》（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碩士論文，2007 年）。

哲學系均有開設「中國哲學史」。由於范壽康是哲學系教授，所以「中國哲學史」雖是中文系必修課，實際由哲學系支援。「中國哲學史」課名約於 1964 年左右改為「中國思想史」，臺灣各大學中文系也應在此時期陸續變更課名。<sup>25</sup>臺大中文系會議在 1992 年決議，「中國思想史」從大四提前至大三開設，仍維持上下學期各 3 學分，共 6 學分。<sup>26</sup>時至今日，依然如此。另外，「哲學概論」一直為必修課，直到 1993 年才取消。<sup>27</sup>

在臺灣各大學中文系從「中國哲學史」更名為「中國思想史」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仍維持「中國哲學史」課名開課，至今依然。據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本系大事紀〉，1950 年，牟宗三先生應聘講授邏輯、中國哲學史；1955 年 8 月，張起鈞先生應聘講授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等課；1992 年 8 月，莊耀郎代

<sup>25</sup> 臺灣大學中文學系將「中國哲學史」科目更名為「中國思想史」，確切的時間尚待考證。另有東海大學的資料可為旁證，據民國 46 學年之東海大學中文系科目表，大四訂有一門必修科目「中國哲學思想史」，上下學期各 3 學分。而 45 學年度課表並無此科目，顯見 46 學年入學新生即是第一屆修習「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學生。（課表可參閱陳惠美、謝鶯興：〈校史文獻的整理與再利用系列（一）——東海中文系課程規劃史料初探〉，《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3 期，2014 年 6 月，頁 94-98）此一課程變革，應與徐復觀先生於 1953 年時，應聘至方成立的東海大學中文系，擔任教授並兼系主任有關。（〈徐復觀先生年譜〉，《徐復觀最後雜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84 年 8 月，頁 429）而徐先生曾於 1956 年 1 月與曾約農校長進行的一場「文史座談會」中，論及此一課程調整，其會議發言記錄為：「四年級增『中國哲學史』四單位。『大二國文』雖注重思想史之資料，但究係片斷之講述，至此則加以貫通綜合，使學生對中國文化精神能得一系統之知識。」（前引〈校史文獻的整理與再利用系列（一）——東海中文系課程規劃史料初探〉，頁 102）可見徐先生認為「中國哲學史」重視「史」的歷程，有助於學生建立中國哲學發展的觀念。然而，此發言記錄的科目為「中國哲學史」，與課表「中國哲學思想史」不同，學分數亦有出入。相較於徐先生在許多學術論文多用「中國哲學思想史」，甚至其研究多以「中國思想史」為名，亦可見此一學科的轉型變化。至 1969 年離徐復觀先生離開東海大學，陳問梅先生於 58 學年起，接替徐復觀先生主講『中國思想史』。（〈陳問梅先生著作目錄〉，《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 5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3-20）。可見得至晚在 1968 年時，東海大學中文系已改名為「中國思想史」。另外，東海大學中文系曾彙編〈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 5 期，1985 年 6 月，頁 99-109）此表所列為 44 學年到 71 學年的年度課表，「中國思想史」於 46、47 學年由牟宗三先生授課，49 至 56 學年由徐復觀先生授課，58 學年起由陳問梅先生授課，編者稱早期資料不全，有所遺漏。唯本表自始即列「中國思想史」為科目名稱，並無課名更動之情形，與前引 46 學年度課表有所出入。其因不明。

<sup>26</sup>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 1929-2002》，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撰，2002 年 7 月，頁 127。

<sup>27</sup>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 1929-2002》，頁 131。

理戴璉璋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sup>28</sup>臺灣三所師範大學（臺灣、彰化、高雄）的國文學系，皆未隨各大學中文系將「中國哲學史」更名。

有學者曾謂「中國思想史」課名的制定，是因應教育部要求同一學院不同系所不得開設相同課名，故為區別同屬文學院哲學系的「中國哲學史」，經過各大學中文系主任開會討論，中文系的課名改稱「中國思想史」。<sup>29</sup>然查證相關大學法令，並沒有如此規定。臺灣現行〈大學法〉，前身為〈大學組織法〉，於民國十八年（1929）七月公布，歷經修訂，於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增修改稱〈大學法〉。本法並無規定大學開設課程名稱，依〈大學法〉頒定之〈大學法實施細則〉，僅於第 24 條提及「大學得依其發展特色規劃課程，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應定期檢討或修正。」並無限制大學開課的科目名稱。而各大專院校依〈大學法〉所訂定的「學則」，僅規範學生不得重複修習相同科目名稱的課程，如〈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 16 條：「重複修習已修讀及格或已核准抵免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複修習之學分不計入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至於開設課程的科目名稱，各校相關辦法均未提及同一學院之不同系所不得開設名稱相同之科目。且實際的情況，在理學院、工學院與管理學院，不同學系開設科目名稱相同的基礎課程，比比皆是，僅部份學系規範不得修習他系相同課名之課程。是故，在沒有更多證據或相關會議記錄，「中國思想史」此一課名的更動是否因教育部的要求而議決，置之存疑。

從科目名稱的沿革，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哲學史」此一學科的建立為先，但因「哲學」具有的西方背景，使得中國學界另以「中國思想史」一名與之對應並反思其意義。至於大學的開課仍以「中國哲學史」為主流，因大學的專業分科，「中國哲學史」多是哲學系開設。國民政府遷臺後，中文系與哲學系均有「中國哲學史」，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文系改「中國哲學史」為「中國思想史」，哲學系則依舊使用「中國哲學史」，此後涇渭分明。學科名稱的沿革發展大致如此，以下從學科內涵分析兩者異同。

<sup>28</sup>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系史網頁。（<https://sites.google.com/view/ntnuchhistory/%E6%9C%AC%E7%B3%BB%E5%A4%A7%E4%BA%8B%E7%B4%80?authuser=2>，檢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13 日。）

<sup>29</sup> 唐亦男師：〈以天台宗文獻為例——論中國哲學史之選材〉，《鵝湖月刊》19：7（1994 年 1 月），頁 1-2。

### 三、「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的學科內涵

由於「哲學」一名由西方傳入，「哲學」的範疇指形上學（Metaphysics）、知識論（Epistemology）與倫理學（Ethics），「哲學史」也指西方自古典希臘羅馬時期以降，在此一範疇中進行思辨論證的各種學派與理論。執此之故，關於中國有沒有哲學，一直是中國學界爭論的問題。若有，是何種形式的哲學？以及中國是否有哲學史？若有，是何種架構的哲學史？以及「哲學史」與「思想史」有何不同？「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該如何分別？這些問題，一個扣著一個。學界對中國是否有哲學，論辯頗多，本文不及於此，僅以牟博（Mou Bo）在編《中國哲學史》的說法為參考。他對哲學採取的認定為：「哲學對世界和人類的根本性問題探究，可以有不同的關注。在這個意義上，哲學所具有的批判性，使其不是一門封閉的學科，也沒有一個絕對的路徑或方法。基本上，只要能通過論證，辯論和解釋，對結論加以討論，就可視之為哲學。」<sup>30</sup>所以，他編著以《中國哲學史》為書名，而非「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宗教史」。這種對哲學的定義，不以哲學為西方所獨有，可使「中國哲學」乃至「中國哲學史」得以成立。

如果將「哲學」視為思辨論證關於人、社會與自然的學科，「中國哲學」即為中國歷史裡的文人學者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然而，中西哲學對於人的提問或許相同，但西方哲學所建立的思考與論辯方式，並非古代中國學人所擅長，甚至中國有著不同於西方的思路與解決問題的方式。執此之故，有關中西哲學之異同，亦是學界長期討論的一大問題。牟宗三先生曾指出中國哲學作為「生命的學問」，「特重『主體性』（subjectivity）與『內在道德性』（inner morality）。」<sup>31</sup>牟先生的講法，自有其思辨理路，但我們很難就此同意，西方的哲學不夠「生命」，只重知性；且「主體性」與「客體性」的對比該如何界定，也必須追究；而「內在道德性」的說法或許可以適用於先秦儒家，但是先秦道家以及諸子，甚至兩漢之後的

<sup>30</sup> Bo Mou, *On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Routledge History of World Philosophies VOLUME 3)*, editor, Bo Mou.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p.2-3.

<sup>31</sup>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4。牟先生從中西哲學對比，指責西方哲學只重視邏輯思辯，不重視（道德）實踐，僅是一種理智的遊戲。藉以突顯中國哲學重視道德實踐的特質，又特別集中論述儒家，謂儒家為中國哲學主流中的主流，而不旁涉佛道。雖然本書為牟先生的演講錄，受限於講題與時間，但仍可視為牟先生對中國哲學的觀點。

各個思潮又該如可？於是，當牟先生的《中國哲學的特質》作為中文系、哲學系的「中國哲學」或「中國哲學史」之參考書目時，應留意牟先生論點之思考理路。

至於在「哲學」之後加一個「史」字，便成「哲學史」一詞，「哲學史」與「時間」有關。由是產生了「哲學史」論述的核心，不僅只是哲學問題，而須注意哲學的發展歷程與前因後果。論者所重者在於以「歷時」與「共時」為軸，除了敘述各哲學家的學說外，尚須呈現彼此間的差異與論辯焦點所在之「共時」關係，以及互相影響與承繼的發展脈絡之「歷時」關係。<sup>32</sup>因此，「哲學史」與「哲學」討論的重心不同，哲學史必須涉及每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及論點，盡可能呈現某一時期的哲學現象；並且藉由陳述個別哲學家的思想，釐清問題或概念的發展與轉變。由於歷史涉及發展，論述依時序，從古至今，是必然的進程。歷史雖是連貫且延續，但論者在講述時，勢必得面對不同時期的思潮。然而，所謂的「時期」，又該如何劃分？

中國哲學史的「分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若歸納目前通行的中國哲學史分期，大多以歷史上政權轉移的朝代為分割點，再輔以該朝代的代表思潮，大致呈現為：「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近現代哲學」。這樣的分法看似清楚，但只能呈現哲學史的部份，也就是以「上層」(high culture) 思想做為時代思潮的代表，而未能觸及「下層」(low culture) 的思想；或者以「學術傳統」(academic tradition) 作為哲學史的主軸，而未及於「意識型態」(ideology)。<sup>33</sup>然而哲學史的發展，常可見上層文化「滲透」(seeping down) 至下層文化，或是下層文化對上層文化的曲解與普遍化。如兩漢時發展出的「三綱五常」之說，是對先秦儒學的曲解。又如魏晉時興起的道

<sup>32</sup> 「共時研究」(synchronic study) 與「歷時研究」(diachronic study) 是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所提出，原是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在於區分複雜的語言現象中，語言系統和語言演化的關係。而此方法可延伸到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甚至哲學的研究。在哲學史中，可藉梳理關於某個哲學論題形成的前因後果，以及某個哲學家在時代潮流中所造成的影響及其地位。

<sup>33</sup> 近代關於「上層文化／下層文化」或「菁英文化」／「大眾文化」的區分，可以馬克思(Karl Marx)提出意識型態(ideology)以及階級觀有密切關係，其後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有許多討論。基本上，將文化區分為兩種體系，上層為高雅的、菁英的，具學術論述的文化型態；下層則為大眾的、流行的，具普及性的文化型態。兩者常有相互影響，甚至移轉的情形。其發生的原因與型式多樣，在中國思想史的討論，可參見余英時：〈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一文。(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1987年3月，頁53-73)

教，其義理與發展，吸收融合了先秦道家、西漢黃老以及神仙方術。這些下層文化，被學術視為不具哲學論證，或者非主要的學術思想傳統，故不在多數哲學史的選材之中。再者，哲學思想有其承襲的脈絡，若以朝代分期，顯得斷裂，不易呈現連貫發展的情形，如魏晉玄學思潮上承先秦道家，並歷經西漢黃老思想以及兩漢方術的發展，至魏晉時期方有「新道家」之興，前後相承，多有因果關係。如果學習者只著重於各朝代的代表思潮，容易忽略這些思潮的來龍去脈。

哲學史不是哲學，哲學也不是哲學史，但兩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卻又不能截然二分。對於哲學的認識，必須透過理解前人的思想，即累積歷代哲學家討論問題的過程，才能建構出新的哲學思想或方法；而哲學史的寫作與閱讀，也必須深入各個哲學家的思想核心，才能做一整體的觀察與理解，此兩者的關係密切。所以，一部哲學史的資料及內容都相當龐大複雜，而且必須能夠儘量客觀地陳述已有的哲學理論、學派及學人的主張。

然而，哲學史該如何「客觀」？是否有「絕對客觀」(absolute objectivity)的哲學史？若哲學史無可避免作者的詮釋，以及敘述觀點或寫作方法，則「絕對客觀」的追求，最終也只能是文獻資料的彙編罷了。但這是否表示哲學史無法「如實」地呈現文獻的意義及哲學史的問題和發展。勞思光先生曾說明哲學史的主觀性及客觀性，指出哲學史一方面涉及哲學層面，一方面則涉及史學層面；而哲學與史學在意義結構(meaning structure)上是兩個不同的文脈(context)。而當兩者結合成「哲學史」時，除了哲學理論與歷史定點之確定外，還有歷史圖像(historical image)展示的問題。<sup>34</sup>勞先生區分了「哲學」與「史」，並論及兩者結合為「哲學史」後的寫作概念及方法，這個說法可為寫作或閱讀哲學史時的參考。

「哲學史」不同於「哲學」，與「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 Intellectual history)的關係也很複雜。人類歷史的發展，「思想」佔有重要地位，近代英國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曾提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著重於深入歷史發展中的「內在」思想理路，方能把握連續性的歷史真相。<sup>35</sup>而此歷史事件中的「思想」，

<sup>34</sup> 參見勞思光：〈哲學史的主觀性與客觀性〉，《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2（1991年6月），頁3-14。

<sup>35</sup> 柯靈烏此一命題廣為人知。（柯靈烏：《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黃宣範譯，臺北：聯經，1981年）柯靈烏此說開啟了歐美史學界對於思想史研究的兩種思路，一是採內在研究法，如美國歷史學家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開創「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著重從歷史文獻中解讀一個相對穩的觀念，在不同時期的演變。

與哲學史討論的哲學家之「思想」該如何區分？黃俊傑曾指出：

「思想史」雖與一般所謂之「哲學史」之範圍有重疊之處。然兩者間亦有其分野在。哲學史研究之對象為某一哲學傳統之持續與變遷，其分析之重點尤在於某一哲學體系內在之邏輯關係。而思想史所研究之對象則為思想經驗之持續與變遷，其重點尤在於透過通史以把握此思想變遷之歷史意義。

36

「思想史」與「哲學史」雖可研究同一對象，但研究方法與著重點不同。奧地利史學家希爾（Friedrich Heer）寫作《歐洲思想史》（*Europäische Geistesgeschichte*），承繼近代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 Dilthey）對歷史理性的批判，反省傳統史學。其「思想史」呈現「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的對立又連結的關係，也強調歐洲歷史並非線性的，而是一種類似螺旋與輻射式的進展。中譯者趙復三指出本書特點時，言及思想史與哲學史不同，其云：

哲學研究通常限於高層次文化的小圈子，不是大眾的事業（雖然大眾並不是沒有哲學思想），因此哲學史的著述通常著重不同時代，從思想到思想的繼承、發展，比較抽象。思想史卻必須探求每個時代思想與社會之間的交互作用，這既是思想史與一般哲學史的區別，又是和一般歷史著作不同的地方。<sup>37</sup>

此一論斷，指出「思想史」研究的範圍較「哲學史」寬，研究對象也不盡相同。對於「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的區分，學界也如是觀。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Transaction Pub, 2009）另一個方法強調歷史的外緣性，即著重於思想家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以及思想在同或不同時空所構成的關係，可以美國史學家布林頓（Crane Brinton）和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為代表。（史華慈：《思想的跨度與張力—中國思想史論集》，王中江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

<sup>36</sup> 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入：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10月），頁245。

<sup>37</sup> 弗里德里希·希爾（Friedrich Heer），趙復三譯：〈中譯者前言〉，《歐洲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3月），頁vii。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於一九九一年四月所舉辦二場學術討論會，針對勞思光先生《中國哲學史》進行討論，楊祖漢先生提出：「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寫作不同，思想史的研究重點是思想的歷史發展，而不重思想概念本身的意義之研究，而後者則是哲學史所重視的。」<sup>38</sup>他認為思想史著重於思想形成的背景，即歷史中的社會各個層面，如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等活動所互相交織影響的關係；而哲學史則是針對哲學系統本身的問題、意義、流變等問題的探討。林慶彰、陳麗真也多同意「思想史」與「哲學史」是不同的，其不同處在於「思想史」的名稱較「寬」、涵蓋面較廣；「哲學史」的名稱較「嚴」、涵義較窄、為抽象問題的探討。而在「中國思想史」領域，更可與西方哲學的研究方法與範圍區隔。

我們還可再進一步檢視「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的著作，從「哲學／思想」、「哲學史／思想史」的比較，可以明白不同學者對「哲學史」與「思想史」的理解與定位，從中做出選擇以為書名。這個分類，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兩個學科的內涵。

#### （一）以「中國哲學史」為名

哲學探討的問題，具有普遍性，若強調哲學是人類文明所共有，不分地域文化，則「中國哲學史」旨在突「中國」的文明特色，應可成立之。但現今以「中國哲學史」為名者，多著重於使用「哲學」的「方法」，探究中國哲學問題。是以，無可避免此「方法」仍是西方哲學的學科內涵，但近代學者有意識地避免直接移植西方哲學的方法，甚至創立屬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以勞思光先生的《新編中國哲學史》為例，勞先生在該書序言一再表示在他之前雖有一些中國哲學研究的成果，但是在「中國哲學史」的部分則付諸闕如。如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完成了上冊，而且全書多在考訂史實，對哲學思想或理論內容未能深入，其問題不在全書完成與否，若完成仍難符合一部哲學史的要求。而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最大的問題，在於其不了解中國哲學的特性所在，雖較胡書為勝，但仍是失敗之作。<sup>39</sup>勞先生以自己的「基源問題研究法」檢視胡書與馮書，

<sup>38</sup> 見韋政通、楊祖漢：〈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的檢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2（1991年6月），頁103-131。

<sup>39</sup> 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序言（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1月增訂六版），頁4。

以哲學方法為衡量哲學史的標準。

當然，勞先生的作品也有值得討論之處，他在《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後序中再度提及馮友蘭哲學史的問題，他說馮氏的哲學觀念是新實在論與早期柏拉圖的形上學觀念，柏拉圖的學說不是不能用，「可是當某一學派或個人，所面對的哲學問題並非這一範圍時，如果解釋者也要用這個思路來解釋，便不能揭示所關問題的真面目及真意義。」<sup>40</sup>然而勞先生花了很大的工夫分析一般研究中國哲學問題所用的方法：「系統研究法」、「發生研究法」與「解析研究法」，分別指出個別缺失，最後提出「基源問題研究法」。他說這方法有三項特色：一、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注意它的邏輯理論部分。二、同時也以史學考證為助力，既注意理論一面，也注意歷史的一面。三、最重要的是找到基源問題，並以統攝個別活動於一定設準之下。因此，他所寫的哲學史，自必有其一貫的判斷原則和基本識見。勞先生的論述看來清楚可行，但問題就在於實際寫作之不易。勞先生在論述儒家哲學時以「道德主體性」為其「基源問題研究法」之所見，但於兩漢、隋唐以及清代儒學的發展，便有所偏頗，明顯重先秦、宋明，而輕其他時期儒學。另外，勞先生論先秦道家為肯定「生」之「情意我」，<sup>41</sup>這個判準也有討論空間，將自我境界分為「德性我」、「認知我」與「情意我」是否恰當？就此三我而言，老莊是否有所異同？至於魏晉時期，玄學的發展與先秦道家的差異，以及道教的興起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勞先生並未論述。除此之外，學者亦論及勞先生的作品主觀性太強、史的脈絡沒有掌握，以及全面判斷設準的統一而削弱了各時期不同理論的差異性。<sup>42</sup>雖然勞先生的《新編中國哲學史》有諸多可討論之處，仍不失為一部重要的中國哲學史，至少此書依循一定的哲學方法，建構出屬於勞先生的中國哲學史。

另外，目前在大學授課廣為採用為教材的《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著），亦有專章討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要言之，西方哲學的方法或概念，有其歷史文化脈絡，雖然在中國哲學的研究可適度採用，但要避免以之為唯一標準。「中國哲學史必須能充分展示出中國哲學有別於西洋哲學的特色。……一部成功的中國

<sup>40</sup> 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後序，頁402。

<sup>41</sup> 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第四章〈道家學說〉。

<sup>42</sup> 見韋政通、楊祖漢：〈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的檢討〉一文，《中國文哲研究通訊》，頁103-131。

哲學史，不應該只是將中國思想史中屬於哲學的部份加以說明，而應該充分展示『中國哲學』特殊性之所在。」<sup>43</sup>此說相對中肯，方法的使用，通常預設了目的與結論，同時也產生了限制，如何在方法的使用上運用得當，是影響一部中國哲學史成敗的關鍵。若從此點審視「中國哲學史」，當可確認能稱之為《中國哲學史》的作品，應能深入分析文獻中的命題、概念與論證諸問題，進而展示哲學思潮的前因後果，而非常識性地介紹說明而已。

## （二）以「中國思想史」為名

由於「哲學」一名譯自日本，又專指西方的學科，為避免混淆，有學者主張中國並無西方式的「哲學」，僅能以「思想」說之，錢穆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可為代表。他在該書序言提到：「若以西方哲學繩律中國思想，縱謂中國並未有純正哲學，亦非苛論。」<sup>44</sup>以西方哲學的角度看中國，本就不會有符合「哲學」的「中國哲學」，若從內容的差異辨析兩者，方可看出中西之異。錢先生認為中國思想以人為本，真理內在於人生，不假外求；西方則認為真理是超越的外在者，故需向外求索。錢先生對東西哲學思想的分判，可上溯至民國初年西方文化對中國造成衝擊時，中國知識份子對中西文化差異的反思。因此在中西文化比較之下，錢先生選擇以「思想」言「中國」，避免「中國哲學」之名引發的「哲學」誤解。

除了從中西文化差異分別「思想／哲學」，亦有從研究範疇分辨之，一般認為思想史的範圍較哲學史為大，如果論述較廣，自然選擇以「中國思想史」書名為佳。如侯外廬先生編著的四卷本《中國思想通史》，他在其書的序言：「這部《中國思想通史》是綜合了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在一起編著的，所涉及的範圍顯得比較廣泛；它論述的內容，由於著重了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說明，又顯得比較複雜。」<sup>45</sup>此書名成因，顯與錢穆先生不同，錢先生針對中西文化不同的特點，強調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故以「思想」區別「哲學」。而侯先生則是著眼於兩者範圍不同，以「思想」論述內容較廣，故用「中國思想史」的名稱。然而，範圍的「廣」，也同時意味著範圍不明，若是綜合「哲學」、「邏輯」與「社

<sup>43</sup> 見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合著：《中國哲學史》（上）（臺北：里仁，2005年），頁14。本書屬四人合著，第一章〈總論〉由高柏園執筆，故引文應是高先生之語。

<sup>44</sup> 見錢穆：《中國思想史》自序（臺灣：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

<sup>45</sup> 見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著：《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

會思想」，又包括「基礎」、「上層」和「意識形態」，就會包羅萬象，無一不是思想了。

如果認定「思想」比「哲學」含蓋範圍廣，就會將討論的對象從文獻擴及生活日常，以為思想史所關注的，是延續並作用在歷史的社會生活中，一般性的普遍知識與思想。提出這種觀點的是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他將原本寫在書前的〈導論〉，擴充獨立成一部《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葛先生反省了「思想史」寫作的對象、範圍、材料與方法，提出「思想史」所描述的是「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歷史」，其義為「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識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對宇宙間現象與事物的解釋，……是一種『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識和思想」。<sup>46</sup>其《中國思想史》兩卷的書名，已反應出這個看法，第一卷為「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第二卷為「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有別於與「哲學史」混同的「思想史」，也不同于近乎文化史的思想史，這兩卷本《中國思想史》呈現對「思想史」的反省與深思，也引發學界熱議。

### (三) 以「哲學思想史」為名

中國的「哲學」雖與西方不盡相同，但是言「思想」又太過廣泛，因此有將「哲學思想」合稱，可以徐復觀先生為代表。徐先生雖無一部正式的「中國哲學思想史」，但其《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便是所謂「中國哲學思想史」的一部分。他在是書序言提及西方哲學除了討論知識之外，多以人生價值等方面為主；而中國文化主流亦以人生道德為探索主題，及其所得結論，當然也可稱之為「哲學」。而「思想史」的「思想」一語，含意太泛，故保留「哲學」一詞，而稱之為「哲學思想史」。他更說道：「在原用的『哲學史』中加入『思想』一詞，不是表示折衷，而是表示謹慎。」<sup>47</sup>徐先生雖謂中國所討論的人生問題，與西方哲學並無不同，故以「哲學」名之並無不可，然而，中國與西方在面對人生問題所採用的討論方式，卻是大不相同的。他說：「思考力的培養，讀西方哲學家的著作，較之讀線裝書，來得比較容易。……我們是要拿西方的砥石磨快了的刀來分解我國思

<sup>46</sup> 葛兆光：《思想史的寫法——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頁15。

<sup>47</sup> 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1月初版）。

想史的材料，順著材料中的條理來構成系統；但並不是要搭上西方某種哲學的架子來安排我們的材料。」<sup>48</sup>徐先生的說法確有其理，也指出學術界的問題，許多論述往往以西方一家一派之說為準，將中國的材料支解納入其中，便成論文。以這種方式處理中國哲學固然不妥，可是要做到徐先生融通兩者又談何容易。由此觀之，徐先生在面對中西哲學時，也清楚明白其間的不同，故主張保留「哲學」一詞之外，另將「哲學」與「思想」合用。

#### （四）以「學術思想史」為名

不論「哲學」或「思想」，似乎都難以合適對應於中國傳統學術之經學，於是亦有「學術思想史」一名，可以林啟彥《中國學術思想史》及鄭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代表。<sup>49</sup>林書在序言有云：「學術思想史的範圍相當廣，所涉及的問題，主要包括經學史、哲學史、思想史三方面。」<sup>50</sup>顯然以「經學史」、「哲學史」與「思想史」區分三者，各有不同，又以「學術」為含攝三者的總名，可見「學術」的範圍更廣。然而本書欲涵蓋的範圍雖廣，但受限於篇幅及讀者對象，其內容反顯得簡要，有如一部中國文化史的重點摘錄。至於鄭書所包括的內容更多，還兼及史學、宗教（傳教過程）。唯本書為其中國通史之分冊，有別於政治經濟，著重在學術文化範圍，亦為中國文化史的重點整理。

經過以上討論，「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在研究方法與範圍皆不相同，既然如此，臺灣各大學中文系與哲學系所開課名不同，理應在授課內容上也有所區隔。然觀察中文系開設之「中國思想史」課程大綱，與哲學系的「中國哲學史」課程幾乎完全一致，所用教材亦皆是《中國哲學史》。兩者在實際教學時，應不會一重社會歷史層面，一重哲學問題。也就是說，儘管這兩個學科確有其差異，但是中文系教師講授「中國思想史」時，仍以「中國哲學史」的方式教授。其原因究竟為何？既然如此，為何中文系不乾脆以「中國哲學史」為課名？關於第一個問題，考察中文系講授「中國思想史」的教師，有中文博士，亦有哲學博士。獲

<sup>48</sup> 參見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代序〈我的若干斷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9月初版九印）。

<sup>49</sup> 林啟彥與鄭士元兩先生皆任教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由於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皆有開設「中國學術思想史」，故兩書皆為課堂講授所編寫，並以為書名。

<sup>50</sup> 林啟彥：《中國學術思想史》（臺北：書林，1994年），頁iii。

得中文博士學位者，也多有哲學相關研究。因此，以教師的學位觀之，僅管有「中文／哲學」的差異，然而在實際講授時仍以「中國哲學史」為主。此應為「中國哲學史」此一學科的建立與發展，有其歷史傳承，較「中國思想史」更為完整。而「中國哲學史」著作亦較「中國思想史」為多，得以選擇做為教學用書，因此在實際講授時，多半仍以「中國哲學史」為之。

最後，我們再考察中文系與哲學系的本質差異。臺灣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內容上以「辭章」（文學）為主，「義理」（思想）、「考據」（小學）為輔；就地域上以「中國」為主，「臺灣」為輔。在課程的安排及內容上，以「中國文化」為主軸，故全名亦為「中國文學系」。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為例，其「系所簡介」之「教學目標」一項，便云：

本系雖名為「中國文學系」，而「文學」一詞乃係廣義之文學，非僅指詩、詞、小說之純文學。故本系之教學目標乃在發揚中國文化，傳授經學、小學、諸子、文學、文獻學等專門知識，以培養學生對於中國語言、文學、學術思想、文獻資料深厚之認知與研究能力。<sup>51</sup>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雖以「中國文學」為系名，但實際授課兼及文字語言、文獻與學術思想。與中國大陸各大學的中文系或中國文學專業最大的不同，就是課程一直保有「學術思想」。從早期的「中國哲學史」，到現在的「中國思想史」，呈現中國文學系具有傳統文史哲兼修的意涵。相較於哲學系，臺灣各大學哲學系皆以西洋哲學為主，中國哲學為輔，此即以「哲學」為系名之義。雖然「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兩個科目確有內涵的不同，但實際教學現場不見得區分，甚至將「中國思想史」當成「中國哲學史」來講授。因此，兩系所開課名不同，並非授課內容有所不同，應是兩系的立場不同所致。

<sup>51</sup> 所引內容為2015年7月20日檢索資料，現已改版。然新版「系所目標」雖改為以「3L」（Literacy、Literature、Literate）為主軸，但然強調「離不開文獻解讀的紮實訓練，同時亦重視學生感悟、理知與研究等較精深與創意能力的發揮，培養學生深入掌握中國語言、文學、學術思想等文獻資料。」（[http://www.cl.ntu.edu.tw/zh\\_tw/Introduction/intro2](http://www.cl.ntu.edu.tw/zh_tw/Introduction/intro2)）

#### 四、「中國思想史」教學用書

從前述「中國思想史」講授時，多半使用《中國哲學史》。回顧《中國哲學史》著作，胡適於 1919 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以西方哲學的研究方法所寫作的中國哲學史，雖然這部書引發許多批評和非難，但余英時認為「中國哲學史」的基本形式和方法是胡適所立下的「典範」(paradigm)。<sup>52</sup>在胡適之前，雖有謝无量的《中國哲學史》，但謝著以學案體的方式，羅列上古三代至清末一百多位人物加以評述，仍屬中國傳統紀傳史學。然而，胡適之作，僅論及先秦為止，之後一直未能續寫完成，因此本書後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晚於胡著十年，馮友蘭在 1931 年出版《中國哲學史》上冊，1934 年全書完成出版。馮著一出，在中國學術界引起震動，也引發學界對「中國哲學史」應為何種型式的各種討論。當時陳寅恪與金岳霖兩位先生對馮著進行〈審查報告〉，皆予以讚譽推崇，也間接對胡適作品有所批評。<sup>53</sup>胡適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代表兩人對「哲學」、「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的不同理解，不論是孔老先後或哲學立場的差異，兩人都各持己見。儘管如此，兩書都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經典之作。

1949 年後，馮友蘭留在中國大陸，並依馬克思主義重寫《中國哲學史》，而有《中國哲學史新編》之作，馮氏的新著，正可代表 49 年之後大陸學界服膺政治的哲學史觀，一直至改革開放後的今日，仍有以唯物史觀為中心的中國哲學史。至於海外中文學術界遲至 70 年代始有另一部中國哲學史經典面世，即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勞思光認為中國哲學屬「引導性的哲學」(orientative philosophy)，與西方哲學屬「知性的哲學」(cognitive philosophy) 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中國哲學史」的首要在於認為「治中國哲學史當重中國哲學之特質，其持西哲以較論之處，於其同點外，當更重其異點。」<sup>54</sup>因此，勞先生檢討胡適、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提出中國哲學中非常重要的「自我」或「主體性」觀念，在哲

<sup>52</sup> 余英時認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在中國清代考證學的延續上所發展出來的，故其在中國哲學史所具有的「革命」與「典範」意義，並非純然引進國外理論而已。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入《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增訂版）》（臺北：中研院、聯經，2014 年 8 月）。

<sup>53</sup> 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附錄」（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sup>54</sup> 勞思光：〈略論作中國哲學史應持之態度及其分期〉，收入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輯》（臺北：水牛出版社，2006 年 3 月）。

學史寫作方法上亦提出「基源問題研究法」，創立其中國哲學史的經典地位。

以教學現場言，不論是上課進行時參考講授，或是讓學生在課後自習閱讀，都必須有教材。目前臺灣各大學開設「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課程，使用最多的是勞思光著《新編中國哲學史》。<sup>55</sup>勞先生的著作出版至今已逾 40 年，<sup>56</sup>之所以為最多學系採用，自有其一定經典地位，但本書在實際教學使用時，仍有一定困難。勞先生的著作雖是講課時完成，但其書的本質是對「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反省後的重構，而非針對初學者。其書在教學時有幾個問題，其一，書中以哲學論證分析各家思想，理路雖清楚深入，但無一定哲學背景者，閱讀實屬不易。於是，教師以之為教材時，必須分神去解釋書中的概念與論證，近乎本書的導讀，而非講授「中國哲學史」。其二，本書篇章內容詳略有別，漢代與魏晉時期過於簡略，宋明又佔大多篇幅。其因為勞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核心在於儒家道德主體性，故推崇先秦儒家孔孟之學，以及宋理儒學的復興，貶抑兩漢與魏晉。其三，述及兩漢魏晉時，過多的情緒用語，對董仲舒與玄學清談的批評。褒貶之間，也影響學生的初入門時的觀念。

上課必須有恰當的教學用書，如何講授也是重點。在民國初年面對「中國哲學史」這一門新的學科，不僅學界有所討論，該如何在大學教授，更是一大問題。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於 1914 年成立招生，據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回憶，他於 1915 年入學，聽陳黻宸講中國哲學史，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學生如墮五里霧，亦抓不到重點。<sup>57</sup>另一位學生顧頡剛，則聽陳漢章講中國哲學

<sup>55</sup> 關於臺灣各大學中文系、歷史系與哲學系，開設「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課程教學用書統計，見附表一。本表整理 105 學年度各大學課程網路公告，由於實際授課不一定同於網路資訊，有些教師可能以自編講義為主，其教學用書僅為參考性質。故本表反映教師填報於網路時的公開資訊，或許不同於實際授課用書，但也可見得一些常見的中國哲學史著作，為授課教師推薦學生閱讀參考之用。值得注意的是，附表一所列舉各校教學用教材，有 12 校為自編教材或與其他專著混合使用，或許也反映出現有中國思想史專著不盡符合授課之用，故講者依自己的授課進度與方式，自行選編製作教材。

<sup>56</sup> 本書原為勞思光先生於香港中文大學授課講義，第一卷於 1968 年 1 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初版，其後陸續出版第二、三卷。臺灣三民書局於 1981 年出版《中國哲學史》第一至三卷，1984-86 年出版修訂後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一直延用至今。見〈勞思光先生著述繫年初編〉，劉國英、黎漢基合編，收於華梵大學哲學系主編：《「勞思光思想與中國哲學世界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2 年 12 月）。

<sup>57</sup>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204。

史，仍是從伏羲講起，一年下來只講到〈洪範〉。隔年自美歸國的胡適在北大講授這門課，帶給學生極大震撼。顧頡剛也提及，胡適截斷眾流，「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撻而不能下。」<sup>58</sup>這段往事，正說明了西方「哲學史」傳入中國，對中國傳統學術產生衝擊。胡適也因授課方式不同以往，引發學生興趣，之後中文系開設「哲學概論」，也由胡適授課。雖然現在的教學現場有別於民初，但如何引發學生興趣，仍是教學首要任務。

目前臺灣各大學中文系與哲學系的「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哲學史」課程授課教材，多半為以下幾種：1、《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著。（以下簡稱「勞本」）2、《中國哲學史》，王邦雄、岑益成、楊祖漢、高柏園著。（以下簡稱「王岑本」）3、《新編中國哲學史》，馮達文、郭齊勇編著。（以下簡稱「馮郭本」）這三種著作是目前各大學教授「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哲學史」兩科目較多使用者。然而，這些著作在寫作時不一定專為授課而作，或者並不專門針對學生而寫，因此在教學使用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如「勞本」是中國哲學史此一領域的重要專著，勞先生以其獨創的「基源問題研究法」談中國哲學史，是一哲學眼光對中國哲學的解析，屬於批判式的著作，而非對初學者介紹中國哲學。也因為他獨特的哲學語言與觀察角度，造成學生自行閱讀的困難，教學上如以本書為教材，還必須費心說解勞先生的思考理路及其問題所在，對於大學初入門者而言，並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著作。再加上「勞本」全部有四冊，主先秦，輕漢代魏晉，重唐宋，輕重有別，也造成教學使用上的困擾。

而「王岑本」則是上課的教材，最初為空中大學所開設之「中國哲學家與哲學專題」所編寫，之後空中大學改變課名，本書也改成《中國哲學史》出版，後來版權移轉至里仁，出版至今。由於本書較偏於「當代新儒家」的哲學史觀，目前在大學任教與其有淵源者多半採用，兼之此書較「勞本」容易閱讀，因此也有不少大學採用為教材。唯本書是集四人之力量寫成，在行文上各有寫作者的不同敘述方式，且本書原是為了分述中國哲學史上的「哲學家」與「哲學專題」，因此敘述重心在於分析中國哲學史上的各個時期重要的人與經典作品，少了「史」的連繫，於哲學思潮的發展與前因後果較少述及。至於「馮郭本」則是馮達文與郭齊

<sup>58</sup>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頁36。

勇兩位教授主編，召集許多學者合力完成，時間跨度從先秦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止。本書在歷史分期、選材與敘述上清楚明了，但最大的問題是採用西方哲學的規範，將中國哲學的討論與解析納入本體論、價值論、人生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各個側面，而且尚難擺脫中國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為哲學解析的基礎，在臺灣教學使用時，必須適時引導學生，也不完全適合上課或自修使用。

另外，坊間尚有數本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著作，為學生升學考研究所之用書。大約有以下數種，吳臻的《中國思想史概論》（鼎茂，2009），本書為補習班的教學講義，之後擴充出版。本書敘述條理清楚，適合閱讀，但以每一個哲學家為一章，對於每個時期哲學發展僅以簡短章節帶過，適合入門者使用，可是做為課堂教材又有所不足。另外，韋政通的《中國思想史》（水牛，1999）也是學子選考研究所的自修讀本，然本書敘述過於淺顯，偏重歷史背景說解，且多個人式的批判，並不適合做為上課教材。還有此一領域的經典，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新編》，前者寫成年代距今已久，且本書分期以及新實在主義的觀點多有討論空間，現今臺灣各大學幾乎沒有採用本書為授課教材；後者為馮友蘭以馬克思辯證主義重新詮釋中國哲學史的作品，唯篇幅過大，論點也不太適合做為臺灣教學用書。還有近來出版的蔡仁厚之《中國哲學史》（臺灣學生書局，2011）本書是蔡仁厚先生從其《中國哲學大綱》發展而成，以牟宗三先生對於中國哲學的分判與解析為基礎，是「當代新儒家」對中國哲學的分析，唯本書有一定深度，文詞用語也較難讀，對於一般大學生仍非一本好的入門與教科書。此外，還有其他各種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有些過於艱深，有些又太過個人式的詮解，又或篇幅過於龐大，故未獲授課教師青睞。

如果只以文獻作為教學用，是否能完全摒除作者的主觀干擾，而只交由文獻呈現呢？葛兆光策劃了一套清華大學專門史教材，即《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在〈總序〉的標題為：「可以用參考資料來代替教科書？」儘管標題使用問號，但其實是肯定句，他說：「代替教科書，更多地閱讀和使用那種解釋成分較少，文獻資料較多的參考資料集，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修正過去依賴教科書的弊病，也可以讀者少一點後設的結論，多一點自己的理解。」<sup>59</sup>其編選文獻的目的，在於企圖擺脫許多思想史的敘述和結論，用心值得肯定。但在實際的教學現場，僅以原典

<sup>59</sup> 葛兆光策劃：《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四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2月），頁II。

文獻是不足的，尤其是學生必須預習和複習時，無法只從文獻了解「史」的延續意義。教師適當的引導有其必須，或者有合適的教材說明，才能帶領學生連結文獻，明白思想史的前因後果。

## 五、「中國思想史」教材的可能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這些思想史教材，皆有偏重，有所長，也各有所不足。若要符合課堂授課所需，又能成為學生課後自修之用者，似乎未能有合適的著作。是以，一部做為講授「中國思想史」理想的教學用書，有幾點可供編寫者參考。以一般教材的角度言，首先，在篇章與內容安排上，必須規劃上課進度，以一週時數能授課完成為基礎。中國思想史得教授不同學術派別，又涉及源流演變，內容繁多，如果能以主題式的規畫進行章節安排，調整內容比重，應有助於教學與學習。其次，各章節前列舉「學習目標」、「本節重點」，便於上課前自習，也能收提綱挈領之效。復次，各節列舉「相關試題」，便於檢測學習成效。亦可選錄各大學升學考試試題，藉由試題，引導學生反思整理學習內容。最後，各節末可附「延伸閱讀」，列舉與該節主題相關之重要專著，供讀者深入學習。

由於「中國思想史」兼含「哲學」與「歷史」，因此教材編寫便得依此特性有所回應。首先，為使學者對思想家有恰當了解，能直接從文本深入，同時避免隨文引用的片段節錄，教材各章節宜列出相關文獻全文，可不另加注釋與翻譯，供讀者閱讀參考。雖然以教材篇幅的限制，不可能附上所有文獻全文，且節錄又有編寫者主觀的取捨，但仍應盡量呈現文獻原貌。其次，文獻引用不限於文字，由於思想史涉及社會背景，還有不同階層的人們活動。故可適度引用圖像或史料，輔助文字，使讀者更全面的了解思想史。最後，教材不能只列舉文獻，還得經編寫者整理說明，故各章節均應適度說解主題，梳理文獻脈絡。這樣編寫的教材，專為初學者與教學設計，或許更能適合「中國思想史」的教學講授。

由於「中國思想史」是中文系的重要學科，學生學習有相當壓力，老師的教學亦然。老師要選用合適的教材，掌握課程進度，設計教學活動，並輔以恰當的評量，才能使學生有所得。然而，學生對於為何必須此一學科的疑惑，或許才是最關鍵之處。正本清源之道，即是追索「中國思想史」的學科發展史，了解「思想史／哲學史」的區別，方是入門第一課。

雖然「中國思想史」在實際教學現場多與「中國哲學史」相同而不分，但兩個科目的名稱仍有指涉的不同，就書名的範疇言，「思想史」論述的範圍較廣，涉及不同社會階級與對象；而「哲學史」相對狹窄，多以具體提出完整論述的學者或文本為研究對象。至於分別以這兩個不同名稱為書名的著作，其基本上都認為中國有不同於西方的哲學思想，以「中國哲學史」為名者，多述及中國也有形上學、倫理學與認識論，只是所重不同；而「中國思想史」更多為擺脫「哲學」的影響，而謂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思想體系，與西方不同，似有與「西洋哲學史」相抗衡的意味。

只是不論「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哲學史」，都必須面對西方哲學的方法、理論及組織架構，不管是否自覺或不得不如此。換言之，教授「中國思想史」時，也不能只有文本解讀與人物分析，還得解釋哲學概念，說明論證方法，甚至進行中西哲學比較。對修習「中國思想史」的學生而言，在閱讀課程教材與參考用書時，都無法迴避「中國哲學史」，因此，學生當有此認知，須儘量充實相關哲學知識。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篇〈導言〉中提到哲學史的三個目的：「明變」、「求因」與「批判」，<sup>60</sup>於今日視之，仍具啟發意義。讀哲學史，必須明白古今思想的延革與變遷，還得思考探究這些變遷的原因，最後分析討論各家學說的價值。對初學者而言，不能只求速成的人云亦云，必須在基本文獻下工夫。教授思想史，也應著重訓練學生閱讀文獻，從進入文本思考理論，教與學都必須投入更多的心力，才能有所成效。

<sup>60</sup> 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2008年12月）。

附表一

105 學年度 (106.8-107.7) 臺灣各大學  
 「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課程與教學用書列表  
 (本表資料依據各學校教學網頁)

科目名稱	大學	科系	主要教學用書／作者
中國思想史	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華語系	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新編中國哲學史／馮達文等
	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新編中國哲學史／馮達文等
	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人文 社會學院學士班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自編教材
	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自編教材
	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思想史講義／自編
	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國立臺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中國哲學十九講／牟宗三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空大版中國哲學史
		中國文學系進修部	自編教材、 中國哲學史／袁信愛
世新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系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自編教材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中國古代哲學史／胡適
	新竹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蔡仁厚
	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自編教材
	華梵大學	中國文學系	自編教材
	南華大學	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中國哲學的特質／牟宗三
	慈濟大學	東方語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玄奘大學	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	中國哲學文獻選編／陳榮捷
	聯合大學	華語文學系	自編教材
中國哲學史	臺灣大學	哲學系	自編教材
	政治大學	哲學系	自編教材
	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史的思想長河／自編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新編／馮達友等、 中國哲學史三十講／張麗珠
	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國文組	中國哲學史三十講／張麗珠

	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東海大學	哲學系	中國哲學史／馮友蘭、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東吳大學	哲學系	自編教材、 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輔仁大學	哲學系	自編教材、 中國哲學思想史／羅光、 中國哲學史／袁信愛
	進修部哲學系	中國哲學史／袁信愛
文化大學	哲學系	新編中國哲學史／馮達文等
華梵大學	哲學系	新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
明道大學	中國文學系、 進修學士班中國文學學系	中國哲學史三十講／張麗珠
真理大學	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	自編教材
長榮大學	哲學與宗教學系	中國哲學史／王邦雄等

◎教學用書詳細出版資訊

- 1、《中國哲學史》(上、下)，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合著，臺北：里仁，2005年。
- 2、《中國哲學史三十講》，張麗珠，臺北：里仁，2007年。
- 3、《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上、下)，陳榮捷編著；黃俊傑校閱；楊儒賓等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
- 4、《中國哲學史》(上、下)，馮友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 5、《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四)，勞思光，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
- 6、《中國哲學思想史》，羅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
- 7、《中國哲學十九講》，牟宗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年。
- 8、《中國哲學史》，蔡仁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
- 9、《新編中國哲學史》(上、下)，馮達文、郭齊勇編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2005年。
- 10、《中國哲學史》，袁信愛，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

## 徵引文獻

### 一、近人專著

- 王邦雄等著：《中國哲學史》（上）、（下），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
- 王國維：《靜安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
- 朱有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
-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
-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增訂版）》，臺北：中研院、聯經，2014年。
-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 沈衛威：《大河之旁必有大城》，臺北：秀威資訊，2011年。
- 林火旺：《道德：幸福必要的條件》，臺北：寶瓶文化，2006年。
- 林啓彥：《中國學術思想史》，臺北：書林，1994年。
-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
-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
- 徐復觀：《徐復觀最後雜文集》，臺北：時報文化，1984年。
- 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一覽（民國23年度）》，北平：國立北京大學，1934年。
- 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一覽（民國24年度）》，北平：國立北京大學，1935年。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撰：《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 1929-20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2年。
-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重慶：正中書局，1947年。
-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年。
- 陳明採訪：《世紀老人的話：任繼愈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陳寶泉：《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四），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

-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 馮達文、郭齊勇編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上、下），臺北：洪葉文化事業，2005年。
- 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
-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三冊），上海：復旦大學，2001年。
- 葛兆光策劃，《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四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2002年。
-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歐陽哲生：《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2011年。
-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臺南：王家出版社，1968年。
- 錢曼倩、金林祥編著：《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
-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 鄭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臺北：里仁，2003年。
-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美〕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9.7
- 〔美〕史華慈著(Benjamin I. Schwartz)著，王中江編：《思想的跨度與張力——中國思想史論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
- 〔英〕柯靈烏(Collingwood)著，黃宣範譯：《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臺北：聯經，1981年。
- 〔奧〕弗里德里希·希爾(Friedrich Heer)著，趙復三譯：《歐洲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

## 二、期刊論文

- 東海大學：〈陳問梅先生著作目錄〉，《東海大學圖書館訊》新 5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3-20。

尙小明：〈抗戰前北大史學系的課程變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頁115-133。

東海大學中文系彙編：〈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5期，1985年6月，頁99-109。

林秀美：〈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簡介〉，《臺大校友》雙月刊，第6期，1998年4月。

韋政通、楊祖漢：〈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的檢討〉一文，《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2，1991年6月，頁103-131。

唐亦男：〈以天台宗文獻為例——論中國哲學史之選材〉，《鵝湖月刊》19：7，1994年1月，頁1-9。

陳平原：〈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臺大、港中大的「文學教育」〉，《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29卷），頁2-24。

陳惠美、謝鶯興：〈校史文獻的整理與再利用系列（一）——東海中文系課程規劃史料初探〉，《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153期，2014年6月，頁94-98。

勞思光：〈哲學史的主觀性與客觀性〉，《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2，1991年6月，頁3-14。

勞思光：〈略論作中國哲學史應持之態度及其分期〉，收入《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輯》，韋政通編，臺北：水牛出版社，2006年。

劉青峰、金觀濤：〈觀念轉認與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二十一世紀》127期，2011年10月，頁77-89。

羅志田：〈大綱與史：民國學術觀念的典範轉移〉，《歷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頁168-174。

Bo Mou, On 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Routledge History of World Philosophies VOLUME 3), editor, Bo Mou.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 三、學位論文

王映文：《晚清新式學堂制度之建立：日本影響因素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林姿君：《臺灣大學的語文學教育及其相關問題初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